



今日速报

3 月 17 日晚，邯郸三初中生杀人案受害者父亲开启直播，其委托律师向大众介绍目前情况。当谈及截至目前家属依然无法见到孩子尸体时，直播间被突然封禁。

导师语录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泽东 1962 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

时评精选

从 3.8 妇女节谈谈无产阶级妇女苦难的源头与解放

3 月 8 日是“妇女节”，是苏维埃俄国在 1917 年设立的，庆祝妇女从旧社会生产关系中解放的节日。

在如今修正主义下的赵国，商家铺天盖地的宣传“女神节、女王节”，将消费主义毒草包装成为妻子 / 母亲 / 女性朋友而慷慨解囊，妇女节转为女神节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攻势，也是在复辟之后将其变为又一剥削手段。

资本主义对“女神节”的营销只围绕从中获利的目的。甚至就连那些宣传妇女力量的活动中的代表人物，也是资产阶级的贾玲、谷爱凌。这些资产阶级女性形象是多么独立、自励，正因为女性在过去历史上的生产关系里往往被困于“家庭”与父权制所赋予的一切枷锁之中，所以当今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所要追求的是从中挣脱出来，并且在基于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她们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这其中却不见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中广大的妇女同胞的身影。深究其原因，还是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深重的剥削压迫脱不了关系。

若要明晰这一状况的由来，就必须讲清楚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归于附属地位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家庭”这一单位承担着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而这一任务主要落在妇女肩上。也就是说，家务保留在妇女身上。尽管实际上这种家务劳动在保证社会生产中至关重要，然而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它的重要性，在一个金钱决定一切的社会里，这繁重而又不受到重视的家务工作，被资产阶级污蔑为“女人的劳作不值什么钱，是无价值的，甚至算不上什么劳动”，资本主义自然排斥这种既不能转化成资本也不能转化成商品的家务劳动，这是它

(下接第二版)



的逐利性决定的。这一蔑视甚至延伸到社会生产领域，育儿、秘书、看护、清洁等工作往往也是“不被资本重视的”。

生产力的发展为广大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资本主义为获取这份劳动力扫除了一切阻碍女性进入生产领域的旧关系。但尽管现代社会女性地位较之封建社会有了提升，也依然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究其原因，正是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而狡猾地将妇女的劳动贬低为“劣质的”，明明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下，男女劳动力在生产领域并无本质差别。一言蔽之，就是私有制的代言人资本家为谋夺更多利益而造成的悲剧，为更残酷地剥削女性而制造的借口。正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样：

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资本家出于对大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将妇女从家庭中推入劳动领域，使得她们从封建社会中“家庭的女仆”转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奴隶”，资本家对妇女劳动的需要，既不是尊重妇女为前提，也不是以解放妇女为目标，恰恰相反，它以无视妇女的人格为前提，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

是的，资产阶级惟有在极尽贪婪地掠夺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上才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而在资产阶级发起的女权运动中，无产阶级的妇女同胞却成了一个注脚。当富士康女

工遭遇猥亵，部门与妇联、工会的反应竟是推脱、扣帽子、解决这位提出问题的工人女同志！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因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只要无产阶级一日还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这一切不公一日就不能停止！

了，你这个事涉及面太广了，我们只能去协调。最后就填了一个表单留了电话就离开了。事隔几天，妇联又打了电话发信息给我，告知我他们已经联合富士康工会一起去解决我的诉求。第二天，线长邓小玲、组长汪家军、课长刘逢叫我去F1栋1.5楼工资办公室，富士康工会也来了两个代表，来了一个法务，还有一个叫张璐的是员工关爱的人，还有部门工会主席梁红卫，妇联来了三个人。他们一直逼问我另外三个人的信息。部门主席这样说道：“车间里很多女工遇到这些事，我们办公室也一样遇到，前两天办公室女生上厕所也被偷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去办公室那厕所看看，上面写着咸猪手，其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跟车间女工相比重要得多，我们都没有办法，其实办公室的女工更需要保护，更需要妇联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富士康工会张璐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心里有病，要看好病后再上班。这个事件不了了之。我无意的几句话竟上了今日头条，再次被叫到办公室，课长和部门主席联合逼问我跟今日头条什么关系，是不是有什么境外势力？不处理不解决反而扣帽子是部门和工会处理的结果。我们原车间都是上的长白班，2021年部门搬到佛山，我不愿意去，在2020年8月被分流到隔壁车间，刚去新部门我上的是长白班。2021年9月28号，两个组长、一个副组长、三个线长一起对我进行面谈，意思就是要给我转夜班，如果你干不了趁早走人。我告诉他们我要去工会反馈问题，线长也跟着我去了，还倒打一耙说我越级。在工会当着线长刘杨、王勇军，何贤东，富士康工会法务张嘉祺，组长田俊、汪家军，副组长金瑞平的面承诺给我上长白班，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亲爱的读者，你读到这里肯定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撕开被两次伤害后续会怎么样？车间领导会怎么对我？为什么结局是被非法解雇，什么原因呢？请往下看……

PS: 我被非法解雇了，如果你是一个律师有意愿打这场官司请联系我本人: 或加微信了解后续情况。

“而资本主义关系一旦改变，妇女在生产领域受到的压迫便会得到根本性改变——他们不再是生产的工具，而是生产的主人。将不会再有人有任何动机去剥夺她们在生产领域中的权利。她们将越来越能支配自己的生产手段和产品，也越来越能支配自己的生存条件。”引自《顾佳悦 | 马列毛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

就如同曾经的中国与苏联，妇女在社会中享有的地位令全世界都难以忘怀，而这并非只是作为一种“需求”被“满足”，毋宁说是在生产领域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们，自然而然地享有的权利。

无产阶级的解放，不将无产阶级的妇女一同解放是决计不成的。一切以男女平等为目的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相结合是不成其事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正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无产阶级的兄弟姐妹们，认清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紧密地团结起来，与资本主义做最后的斗争！

加入我们

telegram 群组链接: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日报现公开接受投稿与订阅:

为方便读者订阅与投稿，现统一采用邮箱进行订阅和投稿。

投稿订阅邮箱: liaoyuandaily@outlook.com

如您有订投稿、需求或对我们的建议，欢迎通过上述邮箱与我们联系

telegram 群组二维码



论无产阶级大民主（八）

阳和平

如果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如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进而迈入共产主义，那么最终只有依赖人民群众才能维护它。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它是监督各级权力机构政权性质的关键，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集中表现，它是培养工农群众直接领导社会的学校。正是在与各种错误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才会得到锻炼，其间的优秀人物才会涌现出来。

那些怕群众的思想，怕群众组织起来“乱”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是替官僚资本反动统治服务的思想。一方面，要民主就不能怕乱。西方国家民主竞选时不是很乱吗？乱在媒体上，乱在舆论上。但是社会上其它的方面并不一定乱，经济不乱，治安不乱，生活不乱。除非资产阶级政权面临象法国 1968 年那样的政治危机，民主的程序并不一定乱。西方国家乱的时候是阶级斗争造成的，而不是民主造成的。另一方面，文革中的“乱”有很多的是走资派挑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根据文革的经验，组织起来的群众可以开会议政，可以推选自己的代表作为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有了群众组织作后盾，权力机构中的群众代表就不容易被架空了，说话就有份量了，就有可能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

现在看来，文革的后期不该在革委会成立以后把群众组织解散掉。当时对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是对的，但是由此取缔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群众组织的解散取消了当权派的对立面，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为走资派后来上台埋下了伏笔。

现在已是很明显的了：一个不受工人阶级监督的一党专制的政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文革中出现的群众组织监督企业和地方的领导是为了防止企业和地方领导脱离群众，为了防止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为了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因此，群众组织的存在

反映了政权的性质，群众组织的取消也预示了政权性质的转变。

当初解散群众组织的理由还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群众组织的派性问题。当时的派性斗争已经把中国拉到了内战的边缘。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人民中还有很大市场的时候，派性的产生是很自然的。

如何对待群众组织的派性问题，如何解决群众组织和党的关系问题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必须进一步通过实践来解决的大问题。

但是原则上来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就是既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又要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的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之一。

一方面，将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了政权以后必须把自己自觉地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要有意识的培养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培养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必须学会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克制自己的派性，尊重不同意见的存在，保障其他群众组织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如果资产阶级经过几百年的实践能够学会在政权相对稳固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法来协调它们阶级内部的冲突，那么将来的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够学会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阶级内部的分歧。

五， 结论

用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来监督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对付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的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和新

(下接第四版)

生官僚资产阶级双方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悬殊对比，他未能巩固其成果，未能将其常规化，因此未能在如何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上走完第一步。这只能靠将来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把毛泽东那一辈未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

(全文完)

刨根问底

借“唯制度论”谈谈革命路线问题

国体决定政体，是马列毛主义的常识之一。即统治阶级具体的执政情况呼唤并要求着政体的变动。与此相对立的就是“唯制度论”，认为政体可以与国体相独立，可以设计出一套“完美”“终极”的制度并维持永恒不变，在这套“完美”的制度的作用下，整个社会就能长治久安、永远保持稳定——这显然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最终得出了这个荒谬的结论。这种错误观点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能看到背后的阶级问题，即最关键的是人，执政的是人，执法的是人，修改制度的也是人。一旦现行的制度违背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制度的修改就是必然的结果。

人是分阶级性的，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并非**是**铁板一块的，经济地位是不同的，因此政治地位也必然不同。因此统治阶级可以操控政治，而被统治阶级则处于被镇压的地位，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执政地位。例如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权贵们把持着政治生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干预政治，例如操纵舆论风向、控制候选人，甚至采取暗杀等卑鄙的手段。

这就是“西式民主”的虚伪，自由主义最欺骗人的地方，就是夹带“政治与经济彼此相互独立”的私货——总统和政府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吗？由此诡辩是人民亲手把法西斯主义者选上了台——因此得出了“这个民族的男女老幼都有罪过，这个民族不值得同情”的法西斯主义暴论。

在当今中国互联网上，这种民族复仇的法西斯主义很有市场，正在甚嚣尘上！这种谬论之所以具有欺骗性，就是因为没有从阶级视角出发看问题，而是用所谓“民族共同体”的思维，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元，认为“同一民族利益一致”，因此得出了无差别复仇和屠杀的暴论。

他们完全看不到人民是被资产阶级裹挟的，人民是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的，选来选去都只会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上台执政。

就算是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手里，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执行结果。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落到了走资派的手里，迟早会被改造成镇压无产阶级群众的、无比反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算迫于历史和群众的压力制订出所谓《劳动法》之类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资产阶级也不会真正地去执行！**毕竟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是靠侵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得来的！**同理，我们把这个道理折射到组织建设中进行分析——再好的制度，被机会主义者执行，也会导致组织走上错误路线，最终不可避免地垮掉。

组织的发展情况也要求着组织制度的不断变化，一上来就要求选举制，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让不了解组织的人掌握投票权贸然做决定，只会把机会主义路线选上来，组织的破灭则是分分钟的事情。**要求组织在建立之初，就采取组织壮大、成熟之后才能建设的制度，就是揠苗助长的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者总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总是要求我们在这一阶段必须要完成下一阶段才能完成的事情——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就该由他来领导，最后导致同志们血淋淋的人头落地——为了满足机会主义者的一己私欲而白白葬送革命！资产阶级的“唯制度论”我们可以轻易地识破，但是机会主义者的各类错误路线呢？很多人就被欺骗了，甚至觉得他们是“为组织着想”的好同志，就这样被机会主义忽悠走了。所以说泛左翼的“大联合”只会是空想，路线斗争是长期存在且不可调和的！只有正确的革命路线，才能够带领我们夺取革命的胜利！